

胡山源 著

文坛管窥

——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

我一生只干过三件事：教书、编交往过各种各样的文人。我想就我所照，留下个纪念。虽然一鳞半爪，合约略窥见时代的影子。于是有空而些，久而久之，居然成帙。我总其名我的意思是“管中窥豹，略见一斑”，作传，只是写他（她）与我的关系，所“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”。



辑、写文章。我认识知，为他们存一个起来也许能从中有兴时，便写上一称为《文坛管窥》。不是为我所写的人以又添了一句副题：

白屋丛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文壇管窺

胡山源 著



白屋丛书

李銳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坛管窥——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/胡山源著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0. 9
(白屋丛书)
ISBN 7-5325-2613-5

I. 文… II. 胡… III. 现代文学—文学评论—中国
IV. I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8717 号

白屋丛书

文坛管窥

——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

胡山源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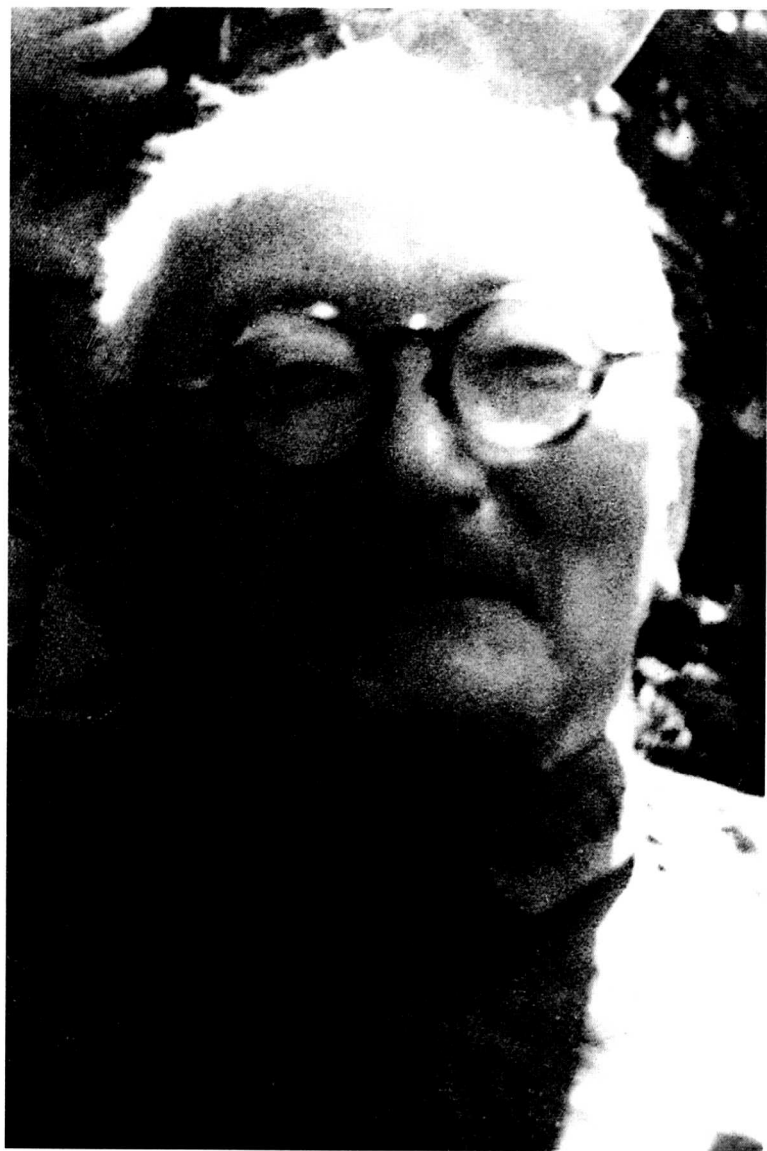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1.125 插页 6 字数 258,000

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000

ISBN 7-5325-2613-5

G·162 定价: 16.60 元



胡山源先生(1897.9.16 ~ 1988.1.1)

编者的话

在现当代的中国历史上,似乎没有另外一个词汇,比“文化”更引起人们经久不衰的注视与思索。世纪初的“五·四”运动,被称为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;六七十年代那场浩劫,则唤作“文化大革命”;到了世纪之末的今天,曾经压倒一切的“阶级斗争”等词汇渐已淡出,而“文化”则成为各行各业都想攀附的一种“热点”,似乎不如此,就跟不上时代的节律。本世纪对“文化”的这种重视,无论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,也无论是建设的还是破坏的,都从不同层次反映了中国人这样一种晚来的自觉:文化问题是一切社会变迁的风信仪,而一切社会变迁,最终又必以文化的更新为鹄的。于是文化的主要承载者——文化人,他们的历史命运、行迹心路,也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,一个越来越被人们关注的问题。

虽然文化人——在古代称作士,历来处于“当路者”与普通民众之间,成为中国社会生活、历史演进中尤其敏感而又活跃的一群,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与思想发展滞缓,他们的路向与心境倒一直比较的单纯。至少从企望为“王者师”的孟子起,他们骨子里总是以先知先觉自居,而当路者与民众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这一点。于是抱着至少是精神上的优越感,他们可以主要从书本中讨生活,以半是历史,半是心想的尧舜禹汤以来的道统,俯瞰着世俗的生活与王权,等待着当路者延为“帝师”,并

进而圆遂其治国济民的种种蓝图,尽管这蓝图往往被前者视为迂阔,而又为后者所漠视。犹疑与困惑也是有的,但除了忠奸真伪一类非士人独有的普遍性矛盾外,主要只是徘徊于出处之间与终极一致的学派归趋上,至于带有文化更新意义的困扰,即使有,也只是至晚明以后方以萌芽状态出现,且尚不具备动摇根本的性质。于是后来被称作“人文精神”的那种知识者的终极理念,那种不可或违的操守与对理想的九死不悔的追求,因其现实内涵的明晰,得以成功地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士人相对平和的心境;对于所谓“虚静”的不渝强调,多少有着这种历史情境的反映。

然而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,使他们骤然震荡。一切因袭的心理矛盾,由原来偏重于谐和而趋向于尖锐对立。从学与从政,过去由“学而优则仕”相统一,现在因着专业的细化与民族的危亡,变得往往不可得兼;而在这两个层面上,过去虽有新学与旧学,新政与旧政之争,有时也形同水火,但因为归趣其实一致,即有去从,亦不妨大节,有所反复,也无伤根本。然而现在,一切新与旧的较量,却往往有了本质意义的对立。即使有幸而仍专注于学术文化的揣摩研创,但面临中国文化的巨大转型,面临他们曾倚以为生的旧文化传统的基础动摇,书斋生活也再不平静,从新从旧抑或新旧合璧的抉择,已关乎民族文化的何去何从;而一旦自觉地或者被动地卷入社会活动,从新或者从旧,也不再仅是个人进退与对一姓国家的是否忠诚,它已直接关乎亿万兆众之民族的能否生存。而这一切又都使他们必须面临这样的痛苦选择,对那曾视以为生命的一贯的节操、信念等等,究竟是应当顺应还是反叛:是幡然觉醒,成为旧世界的挑战者;还是身心分离,在感受甚至祈向着新生的同时,却无可奈何地随着旧势力的沉沦而沉沦。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抉择痛苦，还不尽于此。由于道统观念的实际破灭，他们失去了用以傲视现实的思想依凭，却也因此有可能更脚踏实地，也更充分地发挥作为当路者与民众之交接点的职能。但是转型时期必有的种种扑朔迷离，使原本幼稚的他们常常感到前路茫茫，欲归何之：新与旧的界限并非泾渭判然，新旧之间的得失是非也非斧斫般分明。作为终极理念的“人文精神”，至此已往往因失却安放的基础而变得难以依凭。即使一旦认清了确实先进的新思想新领袖，而甘当追随左右的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，并为他们所深深宝爱的民众沥血疆场，但由于前者在当时同样的幼稚，他们往往被拒之门外，或者进了门又被扫地出门；又由于民众思想对于精英思想的必然滞后，他们如火如荼的热忱，又常常被视为洪水猛兽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屈原的望天呼吁，在当时已成为这身处于动荡时代而尚欠成熟的一群之普遍心声，在这种真诚悲壮的呼吁中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，竟有了具体而微的缩影；而今天当我们返观他们的行迹心路时，也不必为其每多徬徨，时有摇摆而纳闷，因为除了少数的野心家、权谋家以及徇一己私利的叛徒走狗外，这徬徨、摇摆，正是蝉蜕鱼化时期那苦闷的象征。正是基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上述特殊地位的认识，在当今政治家、实业家的传记热中，我们设计了这一套有关文化人的回忆录丛书。

这是一套并非历史书的历史书，虽然它未有史乘的涵盖性与理论体系，但真诚的追忆所展开的生动细节，必将促使我们去思考史乘所叙述的“然”背后的“所以然”，或者这“然”是否确实“然”，从而引发我们对现有种种史学构架的审视与修正。

这又是一套并非知识读物的知识读物，由不同层次、不同经历的文化人所展开的，远比其先辈广阔的社会生活网络，将使读

者对这个部分身历而即将逝去的世纪,油然而起方方面面的真切回忆,并进而了解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种种后果前因。

自然,它们也并非 是小说书,但真诚与素朴永远是美文的底蕴,而文化人特有的敏感与理致,又使这套丛书,在细节的发现与心理的开掘上,更为灵动而精彩纷呈。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,在完成了自己当行本色的学术文化之巨大而艰难的转型同时,也参与并深刻影响了本世纪社会形态的同样巨大而艰难的转型,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何联系?而贯穿其中的文化人与当路者以及民众的历史性矛盾,又是否能给今天某些有益的启示:对于所谓“人文精神”应当如何来理解或者更新?在“造福民众”既因基本利益一致而成为真正的共同目标时,当政的文化人与在野的文化人,又如何才能更多一些相互的理解?在迎接新世纪的钟声时,我们每一个人又应当抛弃些什么,坚持并发扬些什么?等等这些问题,在审读着案头那一部部文稿时,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。于是,想到了一个似乎尘埋既久的名词——白屋。白屋为贫者所居,又衍而为“白屋之士”,肩负民族振兴伟业的文化人——无论是当政的还是在野的,是否应当常记这与民众血肉相联的白屋呢?因取以为丛书名。

赵昌平

1999.8

记山源先生(代前言)

吴调公

古语中有所谓“鲁殿灵光”，意指名负时望的前辈硕德中仅存之人。这一个典故，对我有几层启发：第一，这是早于我们的老前辈；不仅是前辈，而且过去确乎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人；第二，这样的前辈在今天已经不多，为了引为楷模，我们应该向他们好好学习。

不过，鲁灵光殿般的前辈，作为硕果罕存的老人，也还各有不同：有的因为身体衰老或者某些条件所限，尽管过去有过贡献，但现在却不能再做工作或较多工作了；有的尽管年事已高，却仍老当益壮。这种鲁灵光殿式的老人，其志气，其风格，其勤奋，就更值得我们敬佩了。

胡山源先生便是属于后一种的老人。他早年就和唐鸣时等创办文艺团体弥洒社，在五四运动狂飙突起的思潮中，坚持文艺为真、善、美而奋斗。他们那一个文艺团体，脚步极其踏实，不唱高调，不骛虚名，保持着清醒头脑，坚持着纯洁理想，为走向美好的人生境界而奋斗。为此他们赢得了鲁迅的热情赞扬，而山源先生的创作则更成为他们那一个流派的冠冕，被选入鲁迅编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小说二集中。

山源先生是位多才多艺的前辈。除了长期进行创作(特别是小说)以外，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有研究；外国文

学的翻译也很擅长,译笔准确,清新流畅。他在上海世界书局担任编辑有年,又曾任《申报·自由谈》和其他文学杂志的主编。学术研究,文学创作,书局和报刊编辑,高校中文系教授,他都干过。不仅出了丰富的成果,而且干得也很出色。这正是唐代诗评家司空图所说的:“大用外腴,实体内充。”因为根柢深厚,素养扎实,结果就无往而不游刃有余了。

对于这一位学贯中外古今的老前辈,大名是早就知道了,大作也早已拜读过,不过一直不曾见过面。第一次领教,大约在1939年秋天。那时,我的家庭刚搬到上海新闻路永善坊不久。由于我接连向《自由谈》投过几次稿,都被采用了,又听人谈起这副刊是由山源先生主编。出于敬仰之诚,向前辈讨教之心甚切,于是有一天,我便特地赶到汉口路《申报》馆去拜访他。那时,我还只是二十五岁的一个中学语文教员,虽说抗战前也曾写过作品和论文,但在文坛上还只能说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。但山源先生并不因此而对我有丝毫冷漠。他热情洋溢而平易近人地跟我谈了好一阵。主要内容是结合我写的散文加以指点。那时我的散文风格受了尼采的《苏鲁支如此说》和何其芳《画梦录》的影响不小,追求哲理、文采、象征手法和散文诗的节奏,有时华而不实。因此他告诉我,我的风格并非都不可取,但必须避免烦冗、晦涩。这确是打中了我的要害!从此,为了多方请益,我经常往金神父路(现上海瑞金二路)花园坊他的家里走走。谈得多了,再结合他的文章加以揣摩,才看出他的风格,确乎是以简洁、明快取胜,对我的文病是最好的针砭。特别使我记起一件事:1941年初,有个进步刊物《中美周刊》约稿,我给写了一篇取自文天祥《指南录》的素材,意在宣传抗战的历史小说《突围》。先是拿给山源先生看看,经他指出了好几个地方,要我压缩;并认为压缩之所以必要,不仅是关系语言的简洁,实际更影响到情

节、结构的集中。从这透辟的分析,可以看出他创作实践的甘苦之深。按照他的指点删汰一番后,终于在刊物上分三期连载了出来。一时反映强烈。更想不到的是,不久前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来函见告,这一篇还是二十七岁时写的幼稚的东西,竟然被选入《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》之中。如果当时没有山源先生的指点,这篇小说固然不可能改得比较好,而对克服自己烦冗的毛病说来,也将因对之缺乏认识而阻碍了前进的脚步。

山源先生极其好友,而尤爱以文会友,具斯文骨肉之情。尽管按照我的年龄和文学活动的起点来说,同他的关系也只能算是“平生风义兼师友”吧,但他对我们这一辈人,却都作为亲切的友人看待。他待我们,不仅坦率,而且信人以诚。在和他结识不久以后,他便把主编的一个同人刊物《文艺世界》的一些事叫我凑合着去做。及至《文艺世界》停办,改出《正言文艺月刊》时,由于他赶写《明代义民别传》,又在东吴大学任中文系主任,工作相当忙,出于对我的信任,把刊物的大部分具体工作几乎都交给了我。我们这些青年也都乐于和他结为忘年交。围绕着这一位老前辈,伴随着刊物的擘划,写稿过程中的切磋,友谊逐步深入。除了帮他编辑月刊外,还曾经为他编的《红茶》发表过作品。更承他热心介绍,我的第一本散文、小说合集《海市集》于1941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。在他的奖掖下,《自由谈》涌现了一些优秀的青年作者,像袁鹰、李乔、史卫斯等等,都是早已崭露头角的。至于对当时老一辈作家,他也是拳拳备至。如翻译莎士比亚剧作十分精湛的朱生豪,贫病交加,当时靠译书所得的戈戈稿费勉维生活,而译事的促成,山源先生是尽了力的。他如对林徽音、陈友琴等人的组稿,在研究工作中经常和郭绍虞、叶圣陶等联系,都说明他的伐木丁丁的殷切情意。解放后不久,他在福州

大学主持中文系,又远道邀约诸耿和我去任教。我因为安土重迁,不曾离开江苏省立镇江师范。但尔后不久我到了刚建校的江苏师院后,在他的主导下,我们却为北京中华书局编了一套供侨胞用的语文阅读辅导教材。参加者有杨晋豪、章石承、顾巴彦、施若霖和我五人。可惜后来由于国际形势变化,没有能进一步定稿、出版。

山源先生充满着旺盛的生活情趣和事业心。写作之勤,老而不衰。他一直就喜爱体育锻炼,小时在农村长大,身体健朗,思维敏捷,思想达观开朗。文学研究和创作是他的第二生命。直到前几年还乡蛰居时,已是耄耋高龄,但仍然爱惜寸阴,从未辍笔。哪怕视力衰退,他也还是克服各种困难,致力于他毕生为之倾心的文学事业。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,成为我青年时代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巨大动力。直到现在,我也老了;但想到这位比我将近高出一辈的老作家是如此地孜孜不懈,我心里不禁漾起一股温暖的春潮,增加了前进的勇气。

离别山源先生,为时已经很久了。想到埋在尘沙中的岁月,想到旧时代的大泽龙蛇,“孤岛”时期《申报》馆的警卫森严,愚园路上他新居四围的森森静绿,抗战胜利后他和家人来镇江的一次旅游,1957年春我到上海师院去看望他时的促膝倾谈……一切沐浴着友谊的光辉,引起我的缅怀。我的眼前,兀立着一位正直、耿介、朴素的老作家身影。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,有棱有角的方型面庞,透露出刚毅而坦率的眼神。他在寂寞晚年中一直是在奋然前进。他不仅因为是稀有硕果而成为鲁殿灵光,还要因为永远呈现着焕然新貌,永葆青春,成为久而弥新的鲁灵光殿。

自序

1970年春,我在上海所住的里弄被宣告“解放”之后,我就回到江阴老家,长住下来。每天,只要不下雨,我一定出去散步。常去的地方是长江边沿和黄山^①。我曾有两句诗:“故乡亦有佳山水,何必崎岖上玉京!”此外,东郊的农田阡陌间,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走到了。

每天散步回来,便是坐下来,伸纸握管,重操我写作的旧业。除续写长篇外,有时也写一些回忆随笔。我一生只干过三件事:教书、编辑、写文章。我认识交往过各种各样的文人,我想就我所知,为他们存一个照,留下个纪念,虽然一鳞半爪,合起来也许能从中约略窥见时代的影子。于是有空而有兴时,便写上一些,久而久之,居然成帙。我总其名称为《文坛管窥》。我的意思是“管中窥豹,略见一斑”,不是为我所写的人作传,只是写他(她)与我的关系,所以又添了一句副题:“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。”有些人我是没有和他们接触过,他却提到过我,例如鲁迅,我也归入此类。有些人,只有我写信给他过,他没有回过信,例如郭沫若,我也收入我的“文坛”。更有些人,其事业不是文学,其人也并非纯粹的文人,但我认为他有文人的气质,他所了解的文学,或者业余也从事过文学写作,我就不排除他在“文坛”之外,例如陆高谊、唐鸣时等。不过我所写及的绝大多数是文人,道道地地

^① 在江阴境内。

的文人,即使他们的事业不是文学,甚至是反动的,例如陈彬和、陈德征等,我不能不在我的“文坛”上,给他们一席之地。

几十万字已写好,数百文人都写过。我对人说过:此作并不希望即行出版,而且也没有出版的机会。不希望的原因是:我对某些文人,不无“微词”,如果一旦发表,势将引起纠纷。我并不怕人家如何难为我,因为我如此年龄,可以说已到了无所畏惧的地步,但我还是怕纠纷,要我和别人一般烦神。所谓没有出版的机会,那是此作不是“赶浪头”、“趋时髦”的。另外,我不是一字传诵,“洛阳纸贵”的大手笔!我又不会交际应酬,谁也不会顾及我的写作。我只是“聊以自娱”,得到“顾而乐之”,便为满足。

我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嫉视、恼恨的意见,而对于文人,尤其这样。因此,我对他有“微词”的文人,所写的只是当时的感触,基本上我对他是“一视同仁”的。因为我总以为文人最可怜,古往今来,除了曹操、曹丕这两个文人,能发号施令,不必仰人鼻息以外,谁不是倒楣的人?!古文大家,韩、柳、欧、苏,都遭过贬,吃过苦,后世著名的文人,几乎无一个例外。我深有所感,以为文人也者,正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,即以最近两个运动为例,“反右”和“文革”,谁不是将文人先开刀?而雨过天晴了,受害的文人,却迟迟不与恢复原状,有些问题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,“后”而不“乐”,到处可见。即使有的文人,太太平平,终身一帆风顺,也未必真正顺心适意……又何足自夸!何足居奇!我以为“文人相轻”,实在很要不得,而应该彼此谅解,“相濡以沫”的。

有些打击过我的文人,也许由于他们对我不了解,一时的误会,那末我请他们读读这本书,因为其中篇篇渗透着我的思想、情感,也可见出我的行事为人。我生平以不打谎语来自勉,所有的话,出之我口,形之我笔,我必负责到底!如果我当时得罪过

他的,这是我非存心如此,也请他们谅解。我可以向已故的阿英和现在还活着的几个人赔礼道歉,总望他们高抬贵手,放我过去。这是我诚意的话。但这也并非一定要解除我精神上的束缚,为了我个人的利益,实在我愿他们的精力,不要一丝一毫在对付我的事上,而能用之于大目的,与人有益的大事上!

我所写的,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,说不定其中有不少我误会之处,或者听信了不可靠的谣传,不加核实而轻易著笔的。凡此,我在此声明:凡是“褒”的,我非有意阿谀奉承,凡是“贬”的,也不是我有意曲解附会,故入人罪。都不过一时之误,当时来不及纠正,后来一直到现在,也无从纠正起,因为有许多人,至今尚未论定,褒与贬,根本找不到标准。我希望读此书者,不要过分相信我的褒与贬,还请自己从别的方面,多方面窥测,才能给其人以正确的结论。

1985年3月底

目 录

记山源先生(代前言).....	吴调公(1)
自序.....	(1)

郭绍虞(1)	叶圣陶(6)	赵景深(11)	鲁 迅(20)
谭正璧(22)	阿 英(26)	施蛰存(29)	王任叔(32)
王独清(35)	黄碧瑶(38)	郁达夫(41)	茅 盾(43)
郑振铎(44)	周予同(46)	蒋光赤、吴似鸿(47)	
查猛济(48)	徐志摩(49)	邵洵美(51)	徐蔚南(53)
黎烈文(55)	林徽音(56)	陈彬和(58)	陈蝶衣(72)
顾冷观(75)	丁 谛(吴调公)(76)		胡云翼(79)
刘大杰(81)	杨晋豪(82)	钱江春(86)	赵祖康(89)
陈德征(92)	叶天底(99)	洪 野(102)	张闻天(106)
施济美(107)	俞昭明(109)	何守恬(110)	来瑞祯(111)
任大听(任大星)(112)		徐慧棠(113)	
田复春(袁鹰)(115)		沈 寂(119)	程育真(120)
陈伯吹(121)	程小青(122)	周瘦鹃(124)	施若霖(128)
伍特公(139)	张蕴和(140)	黄幼雄(141)	瞿绍伊(142)
天虚我生(陈蝶仙)(144)		严独鹤(146)	詹文浒(148)
程沧波(154)	赵敏恒(156)	潘公展(158)	虞 文(159)
冯有真(160)	李秋生(163)	恽逸群(165)	顾明道(166)
李浩然(167)	陈达哉(168)	范子美(171)	许廪父(172)